

闻一多研究动态

第一三五期·增刊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8年10月

神话的隐喻：闻一多《伏羲考》中的人类学语境
(2017年11月日本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张锦鹏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伏羲考》是闻一多神话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不仅在论证材料上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人类学整体性研究方法和语言结构学研究方法，将碎片化的史料和民俗资料有机串联起来，得出了独到价值的学术观点。《伏羲考》所提出的不同民族人类始祖具有想象的同源性以及各团族融合形成龙图腾的学术命题，体现了闻一多的强烈的学术关怀，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题，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各族人民仍然需要坚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共识，闻一多神话研究在当今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神话研究 人类学理论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 时

代意义

（一）引言

神话研究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闻一多神话研究的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不少，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闻一多神话研究的文学价值，二是闻一多神话研究的史学价值，三是闻一多神话研究的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大多数研究成果集中于前面两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从目前所见，对闻一多神话研究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研究最具功力的研究成果是华东师大田兆元教授《神话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评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一文，文章指出：闻一多对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有着十分通达的理解，吸收了西方人类学的图腾学说，对中国神话进行文献学的综合分析，二者有机结合，运用整体和系统的方法对中国神话意象进行分析，是闻一多先生“神话学研究方法的独创贡献，也是本土神话学研究话语的伟大胜利！”^①此外，相关成果还有孙立涛《解剖〈伏羲考〉：论闻一多对神话学的研究》，该文认为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既运用传统的音韵学、考据学的方法，又借鉴民族考古知识、学习国外人类学理论，并把系统联系与严实的考证结合起来。^②邓乔彬著作《学者闻一多》“以图腾学说研究神话”这一专题，认为《伏羲考》是闻先生将古代典籍记载与考古新发掘所得，以及少数民族流传的民间传说综合研究的结果，是他“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关于图腾崇拜与发展、转化理论、同传统考据相结

^① 田兆元：《神话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评闻一多的神话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此文又以《〈伏羲考〉导读——中国神话一项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载于闻一多著作《伏羲考》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孙立涛：《解剖〈伏羲考〉：论闻一多对神话学的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合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创世、洪水和人类起源神话研究的里程碑式论著。”^①苏志宏《论闻一多的上古神话研究》^②、龙文玲《闻一多〈伏羲考〉与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转型》^③等等，也都强调了闻一多神学研究中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这一特色。但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田兆元教授的研究对闻一多神话研究中所包含的西方人类学理论语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其他研究成果多只在表层上关注到了其学术关联，实质的分析则侧重于从文学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敏锐地注意到闻一多研究神话的民族学人类学议题。如闻黎明教授在《闻一多传》、《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等著作中，指出闻一多在抗日战争对龙的图腾等神话的研究，是在抗日战争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自觉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④牟泽雄《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与民族国家建构》一文，认为闻一多的神话研究，立足于国家民族主义立场，从学术上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实践着他“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和政治情怀。^⑤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讨论到了闻一多为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议题，但或限于文章的研究重点并未全面展开这一内容的研究（如闻文），或文章讨论止于表浅，分析较为单薄（如牟文）。

本文以闻一多重要神话研究代表性成果《伏羲考》为考察对象，探讨闻一多神话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贡献。本文认为，《伏羲考》将

^① 邓乔彬：《学者闻一多》，见《邓乔彬学术文集》第十一卷《学者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6页。

^② 苏志宏：《论闻一多的上古神话研究》，《文艺研究》，1999年第6期。

^③ 龙文玲：《闻一多〈伏羲考〉与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转型》，《民族艺术》2004年第4期。

^④ 闻黎明：《闻一多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⑤ 牟泽雄：《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与民族国家建构》，《民族论坛》2008年第5期。

文献学、中国音韵学、文化人类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机融合，揭示了中国上古神话的文化隐喻——共同图腾崇拜和共同始祖。在这研究中，并非简单地运用人类学资料和摩尔根单线进化论进行分析，而是有更厚实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运用，在人类学整体性方法论上和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研究法、文化转换方法上，都有很好的吸取。闻一多的研究，并非就神话而研究神话，而是与当时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维度展开的“中华民族”的讨论密切关联。闻一多从文化建构论的视角，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对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中华民族”问题讨论的一个回应，这一观点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学术命题，在当时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团结大众、凝聚精神、抗击强掳的时代意义，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亦有促进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二）《伏羲考》研究中的人类学思维

神话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人类学知识谱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很多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诸如泰勒、安德鲁·朗、弗雷泽等，都将上古时期的神话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涂尔干和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等著作对人类学神话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语言结构的深入研究开拓了结构神话学领域，引领着当代人类学深化研究的范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对神话与事实、主观与客观的内部关系的再生产逻辑进行解构，从而得出神话叙事所隐喻的社会真实。

20 世纪初期，中国神话研究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茅盾《中国神话研究 ABC》的出版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之后引人瞩目的成果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闻一多有关神话研究的几篇文章。这些具有开拓性、代表性的中国神话研究成果，

都体现了西方古典进化论人类学思潮的深远影响。以泰勒、摩尔根、弗雷泽为代表的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与文化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人类心理的一致性使得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均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过程。这一派代表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摩尔根，当时中国学术界正值马克思主义思潮勃兴时代，因摩尔根的单线进化论理论被马克思所吸收而对国学者产生广泛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关于尧舜时代的婚制及其演变都是深受摩尔根的影响的。他们认为神话纵然不是历史真实本身，也有历史的真实结构在其中，他们也是把神话视为历史资料的。他们把氏族、部落、图腾、母系、父系这样一些话语反复述说，事实上也把人类学关于神话学的范畴炒热了。”^①

不过，在闻一多的神话研究著作中，虽然也有摩尔根理论的痕印，不过所显现出来的则更为泛化的人类学理论影响。在《伏羲考》一文中，多处出现“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表述，如：关于伏羲和女娲是夫妇还是兄妹，闻一多先是通过文献学进行考证，但从文献学中难以得出明确答案陷入困境之时，人类学的研究给予他直接的启发：“直至最近，人类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许多边疆和邻近民族的传说中，伏羲、女娲原以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②闻一多利用人类学知识，解决了文献学久而未解的难题。

闻一多在《伏羲考》研究中，并不止于利用人类学材料来印证文献学的不足，而是不自觉地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运用于研究之中，“但人类学对这问题的贡献，不仅是因那些故事的发现，而使文献中有关二人的传说得了印证，最要紧的还是以前七零八落的传说或传说的痕

^① 田兆元：《〈伏羲考〉导读——中国神话一项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载《伏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迹，现在可以连贯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了。”^①这里所指的“完整有机体”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在整体性研究方法统领之下所形成的结论。整体性研究方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人类学所研究的人和事件不是独立的、个体的、单一的人和事件，而是与其他人或群体、与其周边自然环境和文化所发生联系的人和事件。因此，对人和事件的研究，要放在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群体、文化场域中进行研究，这就是整体性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在《伏羲考》研究中，就很好地体现了整体性研究的基本原则。神话和传说永远是色彩斑斓、各自独立的故事，这些故事所流传的地域不同，所传播和影响的群体不同，所流传的时期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众多的神话和传说在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是发生分裂的，所形成的历史叙事，也是碎片化。闻一多利用整体性研究方法，在这些碎片化的神话传说叙事中，找到了一个有效解决了共时性与历时性分裂问题的秘密——上下文，即从内容上看是一个故事与一个故事的关联关系，从语言结构上看是语言与言语的关联关系。《伏羲考》一文中，闻一多是这样分析的：（1）在汉族的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是一对兄妹，是人类始祖。（2）与少数民族的兄妹配偶兼洪水遗民的故事具有同源性；（3）伏羲女娲是人首蛇身的神；（4）人首蛇身与交龙、二龙、神龙传说具有一致性；（5）人首蛇身——人类始祖——龙图腾的转化；（6）夏族、匈奴等民族与民族首领与龙图腾的关系；（7）少数民族洪水遗民故事中的葫芦与伏羲女娲的关系。

在（1）中，闻一多从伏羲女娲神话中提取了“兄妹”这一母题，这就是能够与下面的分析形成关联的“上文”。这与（2）种的少数民族“兄妹配偶”的创世故事这一“下文”形成了关联，获得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一命题。在（3）所讨论的伏羲女娲“交蛇”的形象，与（4）交龙又形成了上下文关联，从而得出龙图腾与创

^①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67页。

世之神具有一致性关系的命题。这一命题再次通过(7)获得了更为有力的证据支持,并与(1)和(2)再次形成“上下文”关联。经过这些叙事结构“上下文”的关联,闻一多最终得出了结论:汉族的始祖与少数民族的始祖在本体上是同一的;汉族的龙图腾是众多部落和民族的图腾融合而形成的,是“龙图腾的团族”。^①

可见,在整体性研究的方法引导下,闻一多将神话传说、石刻壁画、田野资料、历史文献有机地利用起来,将其中分离的、碎片化的文化信息提取出来,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合理的解构,形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结论: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结论的深远意义,将在后文进行分析。

闻一多神话研究中,对人类学理论吸收与运用,还体现在其历史文献分析中,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音韵学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神话研究结构分析法的中国图式。

如,在《伏羲考》一文“伏羲女娲与匏瓠的语音关系”中,用音韵学来考证伏羲女娲与少数民族葫芦生人的传说之间的关系时,考证“包”、“匏瓠”与“葫芦”在语音上的转换关系,他分别从历时性(即词意不变但古音的变化及今人使用的语音转换)、共时性(即语音不同但是有共同的词源词意的词语)、地域性(即不同地区指代物品相同但有不同的言语表达)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广泛检索了古代文献,考察某一字词在形、声、意方面的本源、通假、近似、转化的多个方面,探究以字词表达的某两个事物之间在意义上的关联,进行推演得出结论,这是闻一多最为擅长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唯在《伏羲考》中得到很好运用,闻一多许多神话研究成果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特色。如《高唐女神传说之分析》闻一多用文献学、音韵学的知识考察了女娲、高密、高谋、郊谋、郊社、高唐、涂山、简狄之间的关系,得出高唐神女、涂山氏等中国古代民族的先妣,均从某一位总先妣中分化

^①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97页。

而出，并逐渐走下神坛，从神变为人，从神女变为奔女。^①此外等等，不一一列举。

这与西方结构人类学代表、著名的神话学研究大师列维-斯特劳特的研究方式不谋而合。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结构学运用于神话研究之中，指出：“（1）神话，正象语言的其余部分一样，是由一些构成单位组成的（2）这些构成单位以在另外一些水平上——即音素，词素和义素——来分析语言时出现的构成单位为前提，但是它们与后者仍然是有区别的，正象后者自身的之间的差别一样，这些构成单位属于一个更高也更为复杂的秩序。因此，把它们称为整体性构成单位。”^②列维-斯特劳斯所指的“音素、词素和义素”，与闻一多神话研究中对词语的形、声、义的考察有殊途同归之感，音素可对应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声”，发音相同的不同的文字，其表述的内涵可否一致，这是闻一多神话研究考证的一个方面。如上述“包”、“匏瓠”与“葫芦”在语音上的转换关系，闻一多认为，“包”“匏”二字音相同，词义亦相通。词素可以对应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形”，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其字形构造本身就包涵着很多信息，如“瓠”与“瓢”相通，从形的结构近似去理解，是能够得到解释。由此可见，闻一多是将“形”与“义”，“声”与“义”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性构成单位”进行分析的。闻一多的研究不仅在于发现了这其中的“义”的关联，而且在于他的发现是建立在严谨的史料考证基础上，这是闻一多的学术的精深之处。

列维-斯特劳斯用语言学研究神话是受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的影响，尤其是关于音位学的理论。^③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对语言符号学的开创性研究，深刻影响着西方神话

^①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3—34页。

^② （法）列维-斯特劳特：《神话的结构研究》，载叶舒宪选编《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③ 参见列维-斯特劳特：《结构人类学》第一卷、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学的研究，如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也充分吸收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将语言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他用“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分析语言符号的两面，对语言的历时性、共时性和地理性等进行系统研究。^①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兴起之时，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把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研究中国语言问题。闻一多的清华学长赵元任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中国语言研究，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作为一个学贯中西、重视学术前沿的学者，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也包涵在闻一多的学术积淀之中并内化运用于神话研究之中。

闻一多对神话的研究，还涉及到人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转化。人类学的研究终其本质就是意义的研究，它的研究价值在于通过对具象的物之中阐释，获得其抽象的文化意义，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需要学者将其“戏剧的转化能力”揭示出来。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体现出他将中国音韵学和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结合起来，提取历史文献中语言的符号意义，合理地分析了不同叙事文本之际词语的转化关系。

在《伏羲考》一文中，闻一多对伏羲女娲与龙蛇关系首先做了一个理论预设：伏羲女娲（人）传说与龙蛇（兽）传说有关，之间的转化应经历从全兽形象到半人半兽形象，最后才转型为全人形象。按照这一预设，闻一多以由近及远的时间系统进行文献爬梳和考证，最后他找到了这样一个转化过程：

创世神话：伏羲女娲创世之神（全人形象）

战国、东汉至魏晋时期文献：人首蛇身（半人半兽形象）

^①（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与伏羲女娲关联

上古时期的文献：二龙传说（全兽形象）

交龙——交合之意，与伏羲女娲形象的关联

交龙——飞龙——腾蛇的转化

腾蛇——两头蛇

古器物的证据：双龙

于是，闻一多得出了他的结论：“以上这些见于文字记载和造型艺术的二龙，在应用的实际意义上，诚然多半已与原始的二龙神话失去连系，但其运用范围之普遍与夫时间之长久，则适足以反应那神话在我们文化中所占势力之雄厚。”^①在闻一多对各种看似零碎的、互不关联的文化事象进行分析、解码过程中，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文化事项之间的联系性，并分析了它们之间转化途径。分析这些转化所形成的结果，便合理地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象征意义——从双蛇到交龙，从交龙到人首蛇神，从人首蛇身到伏羲女娲，通过了多重符号的转化，龙与中国创世之神伏羲女娲达成了同一。至此，即便闻一多不在文本中明言，读者也明了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独特象征意义了。

（三）《伏羲考》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

《伏羲考》一文考察伏羲女娲、蛇、龙、葫芦、洪水遗民、龙图腾等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闻一多是这样写的：“由上观之，古代几个主要的华夏和夷狄民族，差不多都是龙图腾的团族，龙在我们历史

^①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78页。

与文化中的意义，真是太重大了。”^①

这的确是一个“太重大了”的结论。但是为什么“太重大了”闻一多并没有更多笔墨，但这一定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对当时的时局而言很重要，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回溯中国三千多年传统帝制王权制度，建构了一个基于儒家理论的世界认知体系和国家治理理念，那就是“天下”和“外夷”的观念。清朝末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所携带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和侵略企图彻底动摇的中国的“天下”秩序。重建新秩序，建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需要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如何认识中国的民族和民族属性，就成为政治上和学术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清末年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施行君主立宪制，强调“同种合体”。^②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改变了以前排满做法，倡言汉满一家、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这一个名词也日渐广泛地在各种场合使用。

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建“伪满国”，及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略扩大为全面侵略，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民族分裂的危险。“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另一种张力也不断增强，那就是帝国主义妄图借中国民族问题分裂中国，企图达到瓜分吞并中国领土的目的。中国国内的分裂派和投降派也借民族问题大做文章，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①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97页。

^② 参见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边界始》，《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2-54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20世纪20—40年代，“民族”“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兴起，出现了几次大的有关“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有中国学者引进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研究的观点讨论，也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还有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文刊发后引起的讨论。甚至还有社会各界对什么是“民族英雄”以及是“汉奸”还是“华奸”的讨论，^①等等。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辩。傅斯年、白寿彝、张维华、马毅、费孝通、翦伯赞等从事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都参与这场论辩。^②在这场论辩中，顾颉刚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观点，通过多篇文章表述了“汉夷是一家”，他反对“五大民族”之说，认为这是中国人做茧自缚，成为帝国主义假借“民族自觉”分裂中国之口实。不少学者赞同顾颉刚的观点，纷纷从不同的学术视角讨论进行支持。顾颉刚及支持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中华民族在种族上是同源的；或者是在血统上是相互渗透，“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③二是“中华民族既不组织在血缘上，也不建立在文化上”，中国人只是同一个政府之下共同生活的人；^④三是“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操统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⑤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言）或“中国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言）。顾氏等人的

^① 黄兴涛：《抗战前后对“民族英雄”问题之讨论以及“汉奸”“华奸”之辩》，《人文杂志》2017年第7期。

^② 参见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③ 傅斯年致顾颉刚的信，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④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⑤ 傅斯年致顾颉刚的信，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观点，受到了费孝通等学者的辩驳。费孝通辨析了顾氏观点在理论上的漏洞，认为中国人在文化、语言、体制等方面是有分异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是民族多元与国家统一并不矛盾。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民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于消除这些界限引起的社会不平等。^①顾氏一派有关中华民族同源论，更是引起了一些少数民族学者的反对。如，苗族人鲁格夫尔不赞同苗汉同源论，说：“据我观察所得，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不须学究们来大唱同源论，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②

这场论辩发生在 1939—1940 年期间，当时闻一多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论辩。但是，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有关“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闻一多显然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伏羲考》一文的主体部分（伏羲考引论和第二部分《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发表于 1942 年十二月昆明《人文科学学报》第一卷第二期^③，文章的内容是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即便不能说它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直接关系，但是一定是与这一时期讨论“中华民族”的问题有密切关联。^④

^①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19 期，1939 年 5 月 1 日。

^② 《来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21 期，1937 年 5 月 13 日。

^③ 《伏羲考》中还有《战争与洪水》、《汉苗的种族关系》、《伏羲与葫芦》三张，生前未发表，后来编《闻一多全集》时方从手稿中检出来编入。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 650 页。

^④ 华罗庚在回忆闻一多的文章里，谈到了郭沫若和他本人对闻一多神话研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他这样钻进故纸堆中的工作意义何在，当时很少有人理解，然而，我后来看到郭老对一多这段时间研究和从事古代神话传说的再建工作评价甚高，说一多先生是‘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一多先生从研究神话故事入手，探求祖先的生活情况，探究‘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当时他对

众所周知，闻一多是一个怀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诗人和学者，闻一多曾写过《忆菊》《七子之歌》等充满炽热情感的诗歌赞美自己祖国和表达祖国受欺凌的悲愤之情。在他评价郭沫若《女神》文章《论女神的地方色彩》一文中，闻一多批评《女神》形式和精神过于西化：“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喟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①

闻一多作为一个对祖国充满挚爱的理想主义者，在学界和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中华民族”问题的探讨中，并没有用饱含深情的诗歌、慷慨激昂的演讲等方式来支持他心中的主张，他更愿意从学理上找到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由。《伏羲考》的研究，正是他从学理上探讨这一论辩问题的一个努力。

人类学族群理论中，有四大理论：原生论，建构论，情景论与族群边界论。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出版以来，用文化建构理论来解释民族与民族的属性在学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安德森认为，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特殊文化的人造物”，“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②它并非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

《伏羲考》所考察的问题，就是这种“社会事实”。闻一多研究的起点是伏羲女娲神话。为什么从伏羲女娲开始研究，因为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女娲到底只是汉族的始祖？还是众多民族共

‘槃瓠’的兴趣，显然在对政治的爱好之上。”见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篇》，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07页。

^① 闻一多：《论女神的地方色彩》，载《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120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同的始祖？回答了这个问题，事实就是回答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当闻一多从历史文献、地方民俗、碑刻壁画等多种资料运用，分析得出了中原汉族的伏羲女娲就是南方少数民族的葫芦造人兄妹，他们有共同的母题，是同一神话的差异化表达。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在众多民族的“社会事实”中，他们都有共同的祖先。关于龙图腾的研究，则是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论证。龙是自然现象中没有的动物，为什么中国人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动物？闻一多认为这是“荒古时代的图腾主义”。他从人首蛇身像伏羲女娲造型阐述了了中国的蛇崇拜，而蛇与龙在造型上是最为近似的，龙以蛇为“母题”。闻一多认为并非由“蛇”直接化身为“龙”，而是多个部落图腾合并的结果：“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鬃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①图腾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当某一象征符号是由多个独立的文化象征符号逐渐融合统一，最后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象征符号，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建构过程，建构的目的是达到认同目标。不同的族群有共同的文化认同，那就被“想象”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命题就具有了很强的解释力。

当然，假如说是安德森的文化建构理论影响了闻一多，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闻一多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安德森还只是一个幼儿（1936年生于昆明）。作为一个非人类学学者在持有与当今人类学界主流理论相似的学术观，这虽然不能说是闻一多的先见之明，也至少能够体现闻一多学术思想体系的深厚、博大和远见。闻一多的文化建构论思想来源于什么地方？它既来源于那个时代学者的学术影响，更

^①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80页。

来源于他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深沉热爱。闻一多在《论女神的地方色彩》在这篇文章里，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爱国观与文化观，“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她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她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①

闻一多用学术理性来捍卫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团结，不仅体现在《伏羲考》这篇文章中，而且体现在他的课堂上。1942年5月6日，闻一多应邀到云南省地方干部训练团进行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神话及中国文化”，讲座提纲：

导言：

历史教育与民族意识：

感情产生于知识

不知与猜忌

知与同情

知浅与冷淡

民族意识——知有共同来源

知来源愈悉则民族意识愈坚固

民族主义的心理建设——历史教育

……^②

由此，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了闻一多研究神话研究的学术关怀：

^① 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第121页。

^② 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4页。

通过知识再生产和知识传播来增强社会大众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共识，用文化认同来建构国家共同体。^①

回顾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从梁启超积极倡导“合群”的必要性，要求中国人确立“国群”认同，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五族一家”思想；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到蒋介石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汉、满、蒙、回、藏均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宗支”而非“民族”的“宗族理论”，体现了近现代政治家和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积极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民族国家”观念进一步推进，建立了主权独立、拥有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共和国，赋予人民权力，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等政治制度的实施，中国人完成了从“天下”“外夷”的国家观念向“民族国家”观念的转变，中国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化和国际民族主义泛滥，中国的民族问题又再次成现实中的政治问题和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今天，全体国人都面对着由境外反华势力支持的‘藏独’、‘疆独’分裂中国的图谋，民族分裂集团最核心的理论就是断然否认“中华民族”，认为中国境内的某些“民族”具有独立建国的政治权利。”^②关于“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兴起，有关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成为热点。^③由此看

^① 闻一多以文化认同建构国家认同的理论，与蒋介石推行的以“宗支”建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张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闻一多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政策。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中，认为家族主义以儒家价值体系“孝”为精神，它妨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应该摒弃家族主义观念，走民族主义道路。从这也可以认识到闻一多所言“爱文化”，并非是爱儒家文化，而是爱中华民族共同体几千年创造的优秀文化。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356-359页。

^② 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③ 如近些年来对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有关“国族”、“民族”“中华民族”等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对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及第二代民族政

来，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神话研究的学术成果，时至今日也是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正是有共同的文化根基，才能够不可分割地成为一个国家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交融的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共同体转化升华为一个自觉共同体的根本内聚力。由中华民族文化凝聚而生成的精神动力，正是促进中国更加强大，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四) 结 语

神话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主题。在闻一多著作里，有关神话研究的文章与他的诗歌作品、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的研究著述相比，其成果所占比例并不高，^①但今人对闻一多神话研究成果评价很高：“代表了上个世纪前期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成就”。^②闻一多神话研究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价值是，他开创了中国人神话研究的人类学领域。

人类学神话研究特色，在《伏羲考》一文中最为突出。《伏羲考》在论证材料上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这只是该文的人类学特色一个表现。更为突出的是，贯穿于《伏羲考》全文的整体性研究方法和语言的结构分析，才是这篇文章的人类学话语特色。整体性研究

策得失检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国家演进历史，等等问题成为当今学术热点，都是中国面临现实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

^① 湖北人民出版社《闻一多全集》所收录的神话研究作品有七篇，它们分别为：《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朝云考》、《姜嫄履大人迹考》、《伏羲考》、《神仙考》、《龙凤》、《两种图腾的遗迹》。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伏羲考》为书名对闻一多神话作品结集出版，所选篇目有八篇，它们分别为：《伏羲考》、《端午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嫄履大人迹考》、《司命考》、《神仙考》、“七十二”、《说鱼》

^② 田兆元：《〈伏羲考〉导读——中国神话一项的系统联想与论证》，载《伏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方法作为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很好地将个案、社区的微观研究与全局性的宏观研究有机结合，达到“小社区、大社会”的目的。在《伏羲考》中，闻一多创新性地利用整体性研究方法，将碎片化的史料和民俗资料有机串联起来，找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获得了新的发现。作为有深厚历史文化功底的学者，史料的利用和考证显然是闻一多的长项，在《伏羲考》一文以及他的其他神话研究中，寻求各种零散史料之间的联系，从中国汉字的形、声、义的内涵、通假、转化等多方面进行考察，与现代语言学从语言和言语两个面来分析词义、语义、语音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殊途同归，这与人类学神话研究走向不谋而合，表明闻一多融会贯通吸收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理论的卓著能力。

《伏羲考》并非是一篇纯学术研究的作品，而是一篇带有很强学术关怀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里，闻一多所提出的不同民族人类始祖具有想象的同源性以及各团族融合形成龙图腾的学术命题，是与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几场讨论分不开的。这些讨论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重大时代主题。《伏羲考》这篇文章的结论，阐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观点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正是梁启超、顾颉刚、闻一多、费孝通等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对“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内涵才从以汉族为主体或以几个大民族为主体，向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不断发展，最终完成了概念形塑和政治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族平等团结、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制主权国家建立起来，中国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前进道路上，需要各族人民进一步以文化认同增强政治认同，坚定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实现中国梦。因此，在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闻一多神话研究的仍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作者简介：张锦鹏，女，1968年5月生，云南普洱人。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刊地址：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电 话：(86-10)6527.7905

传真：6513.3283

电子信箱：wenlm1950@163.com